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1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

(1950~1953)——以三次援韓之議為中心

陳昱璋·著

花木蘭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十二編

第1冊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
——以三次援韓之議爲中心

陳昱瑋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以三次援韓之議為中心／陳昱瑋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民106〕

目 2+14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十二編；第1冊)

ISBN 978-986-485-152-2 (精裝)

1. 中韓關係 2. 韓戰

733.08

106014086

ISBN-978-986-485-152-2



9 789864 851522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一冊

ISBN：978-986-485-152-2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

——以三次援韓之議為中心

作 者 陳昱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年9月

全書字數 150722 字

定 價 十二編 13 冊 (精裝) 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
——以三次援韓之議爲中心

陳昱瑋 著

作者簡介

陳昱璋，1989年生於高雄。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現為高中歷史教師。

認為歷史是由人與人之間交織而成的。對於歷史研究，偏好以人物為中心，透過日記、回憶錄、手稿，輔以官方檔案作為交叉分析，企圖以接近本人的角度，闡述不同面向的歷史，也能更了解歷史上的這些人物，是以何種思維做出那些重大的決定。

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民國人物史、中美關係史。畢業論文為《韓戰期間蔣中正的肆應（1950～1953）》。

提 要

1949年12月，蔣中正決議遷臺，以期在臺灣「另起爐灶」。次年3月，蔣中正復行視事，復位中華民國總統，試圖在臺灣重新振作，力求反攻大業。甫遷臺的蔣中正，面臨中共進逼的壓力，被迫相繼撤離海南島與舟山群島，以集中兵力保衛臺、澎地區。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也發表放手宣言。面對美國準備放棄中華民國的態度，蔣中正則積極斡旋，企圖恢復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援助。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3天後，杜魯門宣布「臺海中立化」。讓蔣中正有了喘息的機會，也因南韓總統李承晚向蔣中正請求支援，以及聯合國發布通知要求會員國協助南韓，令蔣中正決議「派軍援韓」。總計韓戰期間共有三次派軍援韓之議，三次之提出與未果之因皆有差異。

首次援韓之議，蔣中正急欲把握機會，積極規劃派軍事宜，欲藉此機會再與美國恢復合作，但美國顧忌蔣中正的介入，會使局面更加複雜，於是予以婉拒蔣中正；二次援韓之議，乃於中共參戰後，聯軍遭到反撲，麥克阿瑟急需支援，國軍為現成戰力。起初蔣中正認為中共參戰，聯軍勢必主動提出國軍援韓，乃主張國軍應趁勢反攻，未料美國企圖以外交斡旋手段結束韓戰，蔣中正暫時放下反攻想法；第三次援韓之議，則由美國主動提出，因停戰談判延宕，美國欲動用國軍打破僵持態勢。然而，並非讓國軍直接援韓，而是提出進攻海南島之計畫，以做牽制中共之用。但蔣中正已積極主張反攻大陸，對進攻海南興致缺缺，雙方並無共識，此議最終仍宣告破局。

三次援韓之議的過程中，可看出蔣中正對於派軍援韓之態度隨韓戰局勢之變化展現不同的因應思維，本文則以三次援韓之議為中心，探討蔣中正於韓戰期間的肆應。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本文主旨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綱要	8
第二章 韓戰爆發前之情勢 (1950年1月~1950年6月)	9
第一節 海南島撤退	9
第二節 舟山群島棄守	23
第三節 韓戰前蔣中正與美國之互動	37
第三章 韓戰爆發國軍請纓 (1950年6月~1951年4月)	49
第一節 首次援韓參戰之議	49
第二節 中共參戰與第二次援韓之議	66
第三節 韓戰設限與麥帥解職	74
第四章 第三次援韓之議 (1951年4月~1953年7月)	85
第一節 韓境停戰談判與美國對臺轉變	85
第二節 第三次援韓參戰之議	96
第三節 停戰談判與蔣中正之斡旋	116
第五章 結論	125
附錄	131
徵引書目	13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本文主旨與研究目的

一、臺灣轉危爲安的關鍵時刻

1949年12月7日，國共內戰接連失利下，蔣中正決意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隨後10日，其偕子蔣經國抵達臺北。遷臺後的中華民國，在軍事上持續面臨中共進攻壓力，領土僅剩大陸內地的西昌一帶，與沿海的臺、澎、金、馬、海南、舟山等離島地區，形勢危急萬分。

如此內外交迫的窘境下，蔣中正仍力圖在臺「另起爐灶」，認為「此時只可盡心盡力，保衛臺灣爲自立自強之基點，首在社會經濟與軍費之解決；其次爲社會民眾組訓與防空之準備；其三爲海空軍用油之購備。」〔註1〕並決心復出主政，以拯救危局：「此時實爲國家命運決於俄頃之際，若不毅然復位，不惟僅存之臺灣根據地不保，中華民族真將永無翻身自由之日。」〔註2〕1950年3月1日，遂宣布復行視事，復位中華民國總統，試圖在臺灣重新振作，力求反攻大業。

先是1949年8月，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似已決心「袖手旁觀」，準備放棄中華民國，靜靜等待中國內戰結束。接著1950

〔註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初版），頁433，1950年1月15日條。

〔註2〕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448，1950年2月14日條。

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宣言，強調不會給予在臺灣的中國軍隊任何軍事援助，持續放手，坐觀其變。所以蔣中正復行視事後，面臨中共進逼的壓力，決議將兵力集中，全心保衛臺灣。

1950年4、5月間，國軍相繼撤守海南、舟山，增強臺灣的防衛；另一方面，蔣透過前第七艦隊司令官柯克（Charles Cooke），試圖爭取在東京的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支持；也與美國親華的「中國幫」（China bloc）成員，共和黨參議員諾蘭（William F. Knowland）等人保持聯繫，全力爭取美援的恢復。

迨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3天後，杜魯門發表「韓戰聲明」（Korean War Statement），宣布「臺海中立化」，使國共雙方皆不得進攻。蔣中正認為韓戰爆發是一個契機，雖然因美國宣布臺海中立化，而無法趁機反攻，但無疑也是與美國重新交好的契機。

於是韓戰期間，蔣中正與美國政府曾有三次討論國軍赴韓參戰，但都無疾而終。第一次在1950年6月26日，由於北韓進逼，南韓節節敗退，不得不向美國求救。蔣中正聽聞韓戰爆發，立即研議派遣國軍馳援南韓。不過美國政府認為國軍參與韓戰，會讓中共有藉口直接參戰；且美國政府抱持著與中共和談的可能，因此拒絕國軍援韓。

第二次在1950年10月25日，中共發動「抗美援朝」，正式參戰。蔣中正認為中共參戰，聯軍應會運用國軍援韓。隨著聯軍11月25日發動「終結戰爭」失敗後，聯軍節節敗退。蔣中正立即派人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盼望爭取參戰。然而，美國政府仍堅持，無論韓國戰場的局勢再嚴重，也不能動用國軍。讓蔣中正軍隊赴韓作戰，非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局面變得更加複雜化。其後麥帥為圖擴大戰爭，遭到解職，第二次派軍援韓的討論也隨之結束。

1951年7月，韓戰進入停戰談判階段，但由於各方僵持不下，使美國有意尋求突破，施加壓力。此時在臺灣，與美國軍援相互配合的蔣中正軍隊，成為了一支現成的勁旅。然而，美國雖然有意運用國軍，給予中共壓力，但卻不願直接用於朝鮮半島上，於是傾向讓國軍攻佔海南島。但蔣中正對此沒有興趣，而是希望反攻大陸，雙方並無共識，第三次派軍援韓參戰議題乃又無疾而終。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蔣中正自 1949 年國共內戰失敗，撤退來臺之後，政局一直處於不穩定的情形。自 1950 年 1 月 5 日，美國宣布對臺「放手」(hands-off) 政策後，更是岌岌可危。然而韓戰的爆發，眾所周知，讓中華民國政府能夠暫時解除困境；加上美援的幫助，遂令中華民國政府逐漸能在臺灣站穩腳步。因此本文首要釐清之問題，乃為蔣中正在韓戰期間，保持著何種想法；以及各個階段中，其對韓戰的觀察與期待。

其次，蔣中正曾三度與美國政府討論派兵赴韓參戰，目的和立場為何？是欲爭取美國認同，又或者是為了反攻大陸計畫，預作安排。而這三次提議之間，是否有著不同的考量，係純為政治上爭取美國支持？抑或是軍事的因素，甚至只為需索美援武器？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另一問題。

然而，因為韓戰爆發，朝鮮半島已成國際重要舞臺。派軍援韓，自然牽動臺美、乃至各國關係，也屬政府遷臺後，外交上的一個試金石。美國政府三次拒絕國軍參戰，三次拒絕的理由是否不同？是由於對國軍的戰力不信任，又或是因政治問題而拒絕？美國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政府與軍方的態度，是否又有所不同？這也都是本文所要釐清的問題之一。

綜合以上問題，本文期望從蔣中正的角度切入，描寫韓戰期間，蔣中正三度欲參與韓戰的原因與相關過程；並輔以美國官方檔案，釐清美國方面拒絕蔣中正參戰的原因。內容則以蔣中正的日記與檔案為核心，並以當時相關人士的回憶錄與檔案文件做交叉分析，期望能將事件全貌解析出來，對於韓戰時期蔣中正與美國關係的研究有所貢獻。

第二節 研究回顧

有關韓戰期間中華民國派軍援韓的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的，多為中華民國與美國在韓戰時期之關係與決策過程，其中可分為美國對臺政策與中華民國對美政策兩方面討論。

韓戰時期美國對臺政策之研究，最早使用美國檔案來探討的學者為梁敬錚，其有三篇關於韓戰時期中美關係之論著，收錄於《中美關係論文集》。此時期由於正逢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其論述對於美國政策的批判性高，對於

美國試圖取代蔣中正政權的思維嚴厲批判；〔註3〕稍晚期，林正義的論著〈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則認為韓戰改變了美國對臺灣的態度，韓戰爆發後美國宣布臺海中立化，並於1950年7月決定對臺軍援，麥克阿瑟也來臺訪問，1951年1月份中、美達成「共同防衛援助協定」，5月美軍顧問團到來，並開始考慮國軍部隊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使用；〔註4〕陳志奇的《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指出美國在中共介入韓戰後，便認為將中共視為亞洲的狄托主義無望，加上韓戰戰略需要，故保臺政策確立，並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註5〕

近期的研究，如陳毓鈞所著《戰爭與和平：解析美國對華政策》，本書以中美相互關係為背景，從戰爭與和平的新角度分析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指出韓戰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方向，臺海中立化與後續決策是為孤立中共，而非保護中華民國；美國保持與中華民國在戰略、政治和經濟上的合作是基於「保護美國現實利益」。〔註6〕戴萬欽的《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論及杜魯門政府對中共與中華民國的應對策略，其中在第五章分析麥帥在韓戰爆發前後對臺灣的態度，認為麥帥在韓戰爆發前即相當重視臺灣，並大力鼓吹臺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性，但也根據研究認為，韓戰爆發後，麥帥並非立即支持使用國軍參戰。〔註7〕

這些研究中，對於美國政策考量的立場論述或有不同，但大致上都同意韓戰爆發，改變了美國對臺政策，使本欲袖手旁觀的美國再度插手。然而，張淑雅在其著作《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張淑雅使用大量的美國國家檔案，解讀韓戰時期美國對臺的決策過程，認為美國在韓戰爆發前，並不是完全袖手旁觀，已有「中立臺灣」的思維，韓戰期間，並非一面倒的支持中華民國，所謂「韓戰救臺灣」，只是美國保持彈性政策，尋求美國最大利益下所產生的結果。〔註8〕

〔註3〕 此三篇為〈韓戰期間之中美關係〉、〈韓戰期中我國國際地位之震撼〉、〈韓戰爆發之謎與中共參加韓戰之秘密〉，收錄於梁敬錫，《中美關係論文集》（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2年初版）。

〔註4〕 林正義〈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研究》第19卷第4期（臺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1989年），頁81～122。

〔註5〕 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市：中華日報社，1981年初版）。

〔註6〕 陳毓鈞，《戰爭與和平：解析美國對華政策》（臺北市：環宇出版社，1997年初版）。

〔註7〕 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年）。

〔註8〕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市：衛城出版社，2011年）。

在張淑雅研究中，對於 1950 年代美國對臺政策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指出在解除臺海中立化後，美國雖加強與臺灣軍事的連結，卻也同時增加了對臺灣軍事的限制，韓戰結束至臺海危機發生，大抵維持這樣的局面；〔註 9〕〈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中則利用美國官方紀錄、藍欽私人檔案，與外交部檔案，以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暨公使藍欽的角度闡述 1950 年代美國對臺政策，〔註 10〕皆為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註 11〕

韓戰期間，美國也恢復了對中華民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經濟援助的研究成果，趙既昌《美援的運用》，將中華民國與美國恢復援助合作後，美援的運用概況做了完整介紹；〔註 12〕文馨瑩，〈美援與臺灣的依賴發展〉，則認為臺灣對於這階段的美援十分依賴，軍事上依靠美援建立起國軍部隊，政治上鞏固了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統治，但也強化了美國對臺灣的控制。〔註 13〕軍事援助部分，張淑雅的研究〈韓戰期間美國對臺軍援政策初探〉，分析韓戰期間，美國對臺軍援政策，認為美國政府由於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偏見，並極力避免為了臺灣與中共衝突，而在軍援執行過程中，給予許多限制，導致軍援成果不如預期；〔註 14〕周琇環的研究〈美國的經援與軍援（1945~1965）〉，則以外交部檔案、蔣中正、蔣經國檔案等，從美國援華政策的形成與演變、美國對臺的軍、經援助、以及美援停止後對臺的影響，做全面性的論述。〔註 15〕

初版)。

〔註 9〕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歐美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1994 年，頁 51~99。

〔註 10〕張淑雅，〈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第 28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193~262。

〔註 11〕其他研究成果如：張淑雅，〈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 年 12 月~1951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6 月）；張淑雅，〈近二十年來的韓戰研究概況〉，《近代中國》，第 137 期，2000 年，頁 105~116；張淑雅，〈不解之解：美國對臺「戰略模糊」政策的緣起與發展〉，收錄於呂芳上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 年）頁 715~756。

〔註 12〕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85 年初版）。

〔註 13〕文馨瑩，〈美援與臺灣的依賴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註 14〕張淑雅，〈韓戰期間美國對臺軍援政策初探〉，《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國際關係史》（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初版），頁 468~510。

〔註 15〕周琇環，〈美國的經援與軍援〉，收錄於呂芳上主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

韓戰期間美國與中華民國互動過程，英國作為美國的盟友，英國態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汪浩的《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 1949～1958》對於韓戰期間英國對臺政策有完整論述，指出冷戰過程中，英國對臺政策分為三派，第一派願意把臺灣交給中共；第二派主張臺灣中立化；第三派支持蔣中正政府，反對中共攻臺。〔註 16〕

韓戰期間中華民國對美政策之研究，陳志奇的《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探討二戰結束後，美國與中華民國互動關係，此書雖是談論二戰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演變，但其中多以中華民國政府的視角來詮釋兩國關係，是中華民國對美政策較早期的研究成果。

中華民國的政策皆以蔣中正為決策中心，國內對於蔣中正的研究成果頗豐，中正紀念堂出版一系列蔣中正研究叢書與論文選輯，收錄國內近年來關於蔣中正於政治、黨政、外交、軍事等各類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

其中對於韓戰時期蔣中正的決策過程相關研究成果，有劉維開的〈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運用蔣中正的日記、檔案等文獻，以蔣的角度，描寫出蔣中正對於韓戰的認知與因應過程，並提及三次與美討論派軍援韓議題；〔註 17〕陳立文的〈蔣介石心目中的「三角形戰鬥群」——聯美、保臺與反攻〉，則試圖解構蔣中正遷臺後所設定的三大目標：聯美、保臺與反攻。探討從遷臺初期以保臺為重，到韓戰結束後，已經達到三方並重，成為完美的三角形戰鬥群；〔註 18〕林孝庭的〈私人化的國家政策：蔣中正、查理柯克與 1949～1951 年間的臺美軍事與安全關係〉，探討遷臺初期至韓戰爆發後，蔣中正的決策過程中，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所提供的建議扮演重大的角色，也影響了蔣中正在韓戰爆發前後，對於各項軍事策略的決定；〔註 19〕林孝庭也於

～1960s)》(臺北市：國史館，2015 年 10 月，初版)，頁 285～322。

〔註 16〕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 1949～1958》(臺北市：有鹿文化，2014 年初版)。

〔註 17〕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收錄於陳立文主編，《蔣中正與民國外交 II》(臺北市：中正紀念堂，2014 年初版)，頁 39～73。

〔註 18〕陳立文，〈蔣介石心目中的「三角形戰鬥群」——聯美、保臺與反攻〉，收錄於劉維開主編，《蔣中正與民國軍事》(臺北市：中正紀念堂，2013 年初版)，頁 401～435。

〔註 19〕林孝庭，〈私人化的國家政策：蔣中正、查理柯克與 1949～1951 年間的臺美軍事與安全關係〉，收錄於黃克武主編，《遷臺初期的蔣中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年 11 月)，頁 417～469。

2015 年將其研究成果，彙整成《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 1949~1988》，書中以中、美兩國檔案交叉分析冷戰時期蔣中正的決策過程。其中第二章談及蔣中正與南韓的關係與對韓政策；以及第四章談及白團與臺美軍事關係。（註 20）

大陸學者對於韓戰時期的蔣中正決策過程研究成果，有林泓的〈解析蔣介石熱衷「出兵」朝鮮之動因〉，認為蔣中正熱衷出兵的理由，表層原因為：（一）響應聯合國號召；（二）對南韓的道義責任；（三）接受聯合國司令的助戰邀請。深層原因則為反攻大陸、爭取美援、提高國際地位，此篇期刊僅為簡單提及諸項原因，並未以史料加以論證。（註 21）何立波的〈蔣介石為何三次無緣朝鮮戰爭〉，則簡要敘述蔣中正三次派兵援韓案的過程，未有史料佐證。（註 22）王楚英的〈蔣介石三次圖謀派兵參與朝鮮戰爭〉，作者在韓戰期間曾任高雄警備區及 52 軍參謀長，作者以當事人的角度敘述三次派軍援韓，蔣中正下令 52 軍赴韓作戰的準備過程，但蔣日記中，指示派軍援韓的軍隊為劉廉一之第 67 軍為主幹，再附加 80 軍之 201 師，與此篇內容似有出入。（註 23）

另外，相關人物的日記、自傳、回憶錄等，如《顧維鈞回憶錄》、（註 24）《孫立人傳》、（註 25）周宏濤回憶錄《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註 26）《陳誠先生日記》等，（註 27）藉此補足檔案與蔣日記的不足。

大致而言，關於韓戰時期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仍是以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研究較多，中華民國面對美國回應與應對過程的研究則較缺乏。因

〔註 20〕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 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初版）。

〔註 21〕林泓，〈解析蔣介石熱衷“出兵”朝鮮之動因〉，《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4 期，2005 年第 1 期（福建：漳州師範學院，2005 年），頁 89~92。

〔註 22〕何立波，〈蔣介石為何三次無緣朝鮮戰爭〉，《蘭臺內外》，2011 年第 4 期（吉林：吉林省檔案局，2011 年），頁 52~53。

〔註 23〕王楚英，〈蔣介石三次圖謀派兵參與朝鮮戰爭〉，《百年潮》2010 年第 8 期（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2010 年），頁 60~66。

〔註 24〕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初版）。

〔註 25〕沈克勤編著，《孫立人傳（下）》（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初版）。

〔註 26〕周宏濤口述、汪士淳著，《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社，2003 年初版）。

〔註 27〕葉惠芬等校編，《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2015 年初版）。

此本文將以韓戰時期中華民國的決策核心——蔣中正的角度，探討這一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美的應對過程。隨著國史館所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等書的出版，得以窺見更完整的蔣中正日記內容；而國史館所藏的《蔣中正總統文物》也逐步整理與解密完成，運用這兩項史料，相信能使研究更趨周延。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史料外，本文亦將使用美國國務院檔案（*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等史料，以及外文專書。期望不僅從蔣中正的角度，並能輔以美方決策過程之記錄，更客觀地呈現韓戰時期所發生的三次派軍援韓過程與雙方態度，使本文之論述角度更加廣泛與完善。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綱要

本文主要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以蔣中正為主，分析蔣中正的日記與相關檔案，釐清蔣中正對美態度，與三次討論派軍援韓的想法；並以比較分析的方法，以中、美雙方的檔案交叉比對，以期客觀呈現出完整的事件論述。

章節安排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主旨、目的、問題，並回顧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第五章為結論，論述蔣中正與美國三次派軍援韓的討論中，所面臨的問題與蔣中正考量的因素。

從第二章開始論述 1950 年 1 月至 6 月韓戰爆發前，蔣中正與中華民國面臨的挑戰。第一節討論海南島撤退之決策過程；第二節討論棄守舟山之決策過程；第三節論述韓戰爆發前與美國之互動過程。

第三章論述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至 1951 年 4 月麥帥解職風波，其中發生第一次與第二次派軍援韓的商議過程。第一節為第一次派軍援韓的討論經過；第二節從 1950 年 9 月聯軍仁川登陸至 10 月中共參戰，討論韓戰局勢的變化，影響動用國軍派軍援韓的可能；第三節從 1950 年 12 月聯軍失利至 1951 年 4 月麥帥解職，為第二次派軍援韓討論過程之始末。

第四章探討 1952 年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態度轉變，與第三次派軍援韓的討論經過，以至 1953 年 6 月至 7 月停戰前，韓美衝突中，蔣中正的斡旋過程。第一節討論停戰談判陷入僵局，美國改變對中華民國的態度；第二節討論第三次派軍援韓的經過，美國欲請中華民國攻佔海南島，而蔣中正一心欲反攻大陸，雙方未成共識；第三節為韓戰停戰前，韓美意見產生衝突，蔣中正介入斡旋，力求反共同盟不因此破裂的過程。

第二章 韓戰爆發前之情勢

(1950年1月~1950年6月)

1949年國共內戰逐漸告一段落，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軍事上面臨了中共越過臺灣海峽進攻臺灣本島的危機，國際上又面臨美國準備放棄臺灣的可能。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復位中華民國總統。面對中共侵臺的危機，蔣中正思考著將兵力集中保衛臺灣本島上，於是決定陸續從海南、舟山島撤退。外交上透過前第七艦隊司令官柯克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等親華的美方人士聯繫，試圖改變美國總統杜魯門所發表的放手政策，挽回美國援助。本章就蔣中正的角度看海南島與舟山島撤退之決策過程以及韓戰爆發前蔣中正與美國的互動等三方面作為本章所探討的內容。

第一節 海南島撤退

海南島，亦稱瓊州，是中華民國僅次於臺灣的第二大島，陸地面積達33,210平方公里，海域面積約200萬平方公里。1949年國共內戰，國軍節節敗退，10月13日廣州失陷，國軍部分撤退至海南島上。先是2月23日，陳濟棠受命為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兼建省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註1〕至是遂與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共同管理海南島，並令薛岳統籌來自各地的軍隊。〔註2〕然

〔註1〕「蔣中正任陳濟棠海南特區行政長官」（1949年2月23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八年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9-023。

〔註2〕「蔣中正自臺北致薛岳電」〈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二）〉（1949年12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9-140。

而，隨著 11 月 30 日重慶與 12 月 6 日成都相繼淪陷，中華民國在整個大陸地區僅剩西昌一帶，海南島作為後方接應的功能已失。究竟是守或撤，令蔣中正十分苦惱。

一、欲撤海南之因

撤退來臺後，中華民國政府處於十分危急的狀況，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陳誠對於當時的情況如此形容：

論國土，僅剩下一些分散的島嶼；論人民，連老弱婦孺在內不過八百萬人；論武裝，幾十萬殘破的部隊，固有戰志而無戰備，全部軍火的總和也不夠打一兩天的仗；論財力、物力，就更不堪設想了。

〔註 3〕

蔣中正也感到相當憂慮，首重加強防衛最後的基地臺灣，自記：「此時只可盡心保衛臺灣為自立自強之基點，首在社會經濟與軍費之解決；其次為社會民眾組訓與防空之準備；其三為海空軍用油之購備。」〔註 4〕甚至表示：「萬一臺灣不幸淪陷，則余必身殉黨國，決不自負平生也」，〔註 5〕已做好臺灣可能淪陷的心理準備。對於防止中共進攻的構想，蔣中正認為臺灣本島與舟山、海南、金門等地區的海防與空防非常重要，並指出現階段國軍的海、空軍實力雖高於中共，但中共可能透過蘇聯的援助，提高其海、空軍實力，認為：「現在我們陸海空軍各方面最大的缺點，就是精神鬆懈，缺乏警覺，尤其是因為共匪一向沒有空軍，所以對於防空，根本沒有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遭遇共匪的空襲，不但在物質上要受到很大的損失，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受到最嚴重的打擊。」〔註 6〕

除了提升各戰區的海、空防禦之外，蔣中正也開始思考撤離海南島一事，1 月 26 日召見參謀總長顧祝同，商議海南撤退方針。〔註 7〕顧祝同隔日也呈上

〔註 3〕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 110。

〔註 4〕 秦孝儀總編纂，《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 年初版），頁 15；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頁 433，1950 年 1 月 15 日條。

〔註 5〕 秦孝儀總編纂，《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 29，1950 年 1 月 27 日條。

〔註 6〕 秦孝儀主編，《最近國際局勢之演變與我們反共抗俄之前途》，《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三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115～118。

〔註 7〕 秦孝儀總編纂，《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 29，1950 年 1 月 26 日。

《地字第一號計畫》向蔣中正報告關於海南現況，與規劃四種撤退海南的方案。方針為徹底集中兵力，確保臺灣基地，應于適當時機，將海南島全部（或大部或一部）國軍及重要軍品安全撤出，以加強臺灣及定海金門之防衛。而撤退分四案，甲案：全部國軍及軍品即刻撤離案；乙案：主力撤離一部留瓊游擊案；丙案：一部先撤主力縮短防線退守瓊南待運案；丁案：暫緩撤退俟擊破來犯匪軍後再議案。評估應以甲案優先，丁案雖最有利但勝算不高，乙丙案則為甲案之後續。〔註8〕

蔣中正為何考慮要從海南島撤離？有幾項原因：其一是地理位置，海南島距離臺灣本島約1,300公里，距離雷州半島僅30公里，若發生大規模作戰，兩方在支援上將會產生極大的差距，蔣經國也對此曾坦承：「華北、西北、西南個重要地區，相繼失陷，海南與舟山兩地，已成孤立無援地帶，今後對此兩地的運輸與補給困難尚在其次，而以寡敵眾之形勢，恐終將為共匪所蠶食也。」〔註9〕

其二是財政困難，由於海南島本身並無法自給自足，需由臺灣特別支出軍費支援，陳濟棠就曾電蔣中正稱：「海南情形特殊，經費無法自足必需中央予以特別補助。戡亂時期各費出支浩繁職署經費不敷甚鉅，盼能予照發每月特別補助費銀元肆拾萬元藉維困厄，而速行政效率云。」〔註10〕其後再電蔣，盼能縮減海南島部分中央機構，以節省開支，提出廣東審計處、交通部沿海區航政局、交通部海口電話所、各縣地方法院等四個機構可以縮編。並強調此「係就海南實際情形為依據，並為中央減輕負擔而認為可行者。」〔註11〕而蔣中正也明知「無論財力、兵力，非舍瓊則不能保臺，二者不能兼全。」〔註12〕以致時感左右為難，「決定海南不撤守，惟軍費難籌也。」〔註13〕

其三是地方環境，海南島本身即是中共長期經營的一個地區，對日戰爭時，已有游擊隊在此抵抗日本的入侵。1944年對日戰爭進入尾聲，中共將其

〔註8〕 〈顧祝同呈蔣中正軍事計畫〉（1950年5月2日），〈金馬及邊區作戰（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102-004。

〔註9〕 蔣經國著，《風雨中的寧靜》（臺北市：黎明出版社，1975年第五版）頁250。

〔註10〕 「陳濟棠自海南致蔣中正電」（1950年1月10日），〈人事——經費（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9-00016-014。

〔註11〕 「陳濟棠自海南致蔣中正電」（1950年3月14日），〈粵桂政潮（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0037-007。

〔註12〕 秦孝儀總編纂，《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54，1950年2月27日條。

〔註13〕 秦孝儀總編纂，《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80，1950年3月20日條。